

CSSCI 来源集刊

2016 01/02
VOL.1

管理学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Management

李新春 徐二明 李 垣 Haiyang Li (国际) 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主办单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管理学季刊》编委会

主 编:

李新春 (中山大学)

徐二明 (中国人民大学)

李 垣 (上海交通大学)

Haiyang Li (Rice University, 国际)

领域编辑:

竞争战略: Dean Xu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Tieying Yu (Boston College),

张书军 (中山大学)

战略与公司治理: Wei She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辛宇 (中山大学)

全球战略与跨国管理: Sali Li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马旭飞 (香港中文大学)

创业与创新: 路江涌 (北京大学), 魏江 (浙江大学), 任兵 (南开大学)

战略与领导行为: 贾良定 (南京大学), 梁建 (上海交通大学)

制度与组织变革: 贺小刚 (上海财经大学), 井润田 (上海交通大学)

本期责任编辑:

贾良定 (南京大学)

张书军 (中山大学)

马旭飞 (香港中文大学)

编辑部:

朱 沅 (中山大学) 编辑部主任

李炜文 (中山大学)

秦 昕 (中山大学)

文字编辑:

辛 宇 (中山大学)

评审委员会 2016 (按姓氏拼音排序)

杜 旌, 武汉大学
杜义飞,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杜运周, 安徽财经大学
窦军生, 浙江大学
高旭东, 清华大学
古志辉, 南开大学
关浩光, 上海财经大学
郭 海, 中国人民大学
江诗松, 武汉大学
姜 嫻, 南京大学
江 源, 上海交通大学
李晓蓓, 华东理工大学
李炜文, 中山大学
李雪灵, 吉林大学
李 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连燕玲, 华东师范大学
梁晓雅, 复旦大学
林道谥, 中山大学
林 嵩, 中央财经大学
刘景江, 浙江大学
买忆媛, 华中科技大学
秦 昕, 中山大学
戎 珂, 北京大学
宋继文, 中国人民大学
苏依依, 同济大学
苏中锋, 南京大学
孙 霏, 复旦大学
邬爱其, 浙江大学
武亚军, 北京大学
魏 峰, 同济大学
魏 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魏泽龙, 西安交通大学
卫 田, 复旦大学

吴建祖, 兰州大学
吴树斌, 上海财经大学
谢 恩, 西安交通大学
谢绚丽, 北京大学
杨 俊, 南开大学
杨 治, 华中科技大学
姚小涛, 西安交通大学
于晓宇, 上海大学
张 钢, 浙江大学
张 宇,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仲为国, 北京大学
朱 虹,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Guoli Chen, INSEAD
Geng Cui, Lingnan University
Lin Cui,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Vivian Guo,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nyu He,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nneth Hua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an Li, Indiana University
Yan Ling,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Jiao Lu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unny Li Su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Yi Tang,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Yanbo Wang, Boston University
Yue Wang, Macquarie University
Liqun We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Sibin Wu, University Texas-Pan American
Jun Xia,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Gracy Yang,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Haibin Ya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Kong
Xiaoli Yin, Baruch College
Minyuan Zhao,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管理学季刊》发刊词

战略管理学科的重大发展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尤其是 1978 年《战略管理学报》(*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的创刊发行,以及 1981 年战略管理学会 (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 的创立,无疑标志着战略管理作为一个专业学科有了自己专门的研究领域、理论和问题,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学术共同体,并建构了一个专业的学术交流发展平台。自此之后,战略管理学科得以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管理学知识创造的重要基地,以及与管理学实践相联结的桥梁。创业学科的发展也大致如此,如创业领域自《商业创业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创业理论与实践》(*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等期刊创立以来,创业研究得以迅速扩展。以美国管理学会 (Academy of Management) 创业分部 (Entrepreneurship Division) 的会员数作为一个指标可以看出其发展态势,会员数从 1990 年的 688 人发展到 2016 年 (截至 3 月 14 日) 的 2964 人,增长了 3.3 倍。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专业委员会的创立以及专业期刊的发行建构了一个知识场域,为这一领域向一个成熟学科发展奠定基础。

管理学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一方面可以跨越国家和地域的界限,具有全球化的倾向;另一方面,管理学知识的发展也具有典型的地域和制度文化特征,具有丰富的情境性。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本土制度文化和市场结构特性之上的管理学知识的创造和发展就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学科的发展正是这一知识全球化与本土化发展二元融合的典型案列。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初全面引进西方 (全球一般性意义上的) 管理学知识,翻译教材,引入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到研究上消化吸收其理论体系,模仿学习其研究方法,表现出国际或西方主导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知识系统在我国扩散传播,这一过程至今仍然势头不减。同时,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的知识创造开始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自我意识和行动,这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关注本土问题、本土情境的知识创造和新方法的运用,也体现在知识共同体的建构上,包括专业学会和专业期刊的成立和发展。

坦率地讲,国内与管理相关的学术刊物并不少,但大部分都偏向于微观层面的管理问题 (micro-management) (如心理、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等),而着重于相对宏观管理 (macro-management) (如战略、创业、创新等) 的学刊并不多。中国管理学的知识创造,尤其是战略、创业、创新以及组织管理等领域的发展亟须一个高质量的中文专业期刊平台,以推动全球知识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也有助于中国制度文化情境下的本土知识的创造,这是学界同仁的一个共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管理学季刊》应运而生。

我们深知,打造一本高质量的专业性学术期刊并不容易,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区别于其他管理学刊物,《管理学季刊》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定位:

第一,《管理学季刊》的创立致力于推动战略、创新和创业领域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我们认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建构首要的不是要赋予其一个团体形式,而是在于学术共同体内各个领域之间通过学术研究和探讨达成一致同意和集体行动,所谓一致同意也不是指大家在任何一个方面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而是在学科发展主要的目标定位、团体的组织和行动等方面形成话语共同体和建立研究规范。本刊正是为了这个共同体的目标而建立的开放式平台。

第二,《管理学季刊》拥有强大的编委和评审队伍、透明而又严格的评审流程,从主编到编委会,都由国内和国外顶尖的学术领军人物共同组成,这是本刊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学术刊物的重要方面。在评审过程中,我们的编审队伍不只是简单地选择优秀的稿件,而是要去发现有潜力的文章和作者,通过不断地“修改和再提交”(revise and resubmit)的过程来帮助那些作者完成高质量的研究。因此,本刊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帮助培养有潜力的学者,尤其是年轻的学者,让他们的研究迈向更高的台阶。

第三,徐淑英教授在本刊开篇文章中指出如何做一个有益于社会、负责任的价值取向的学术研究(见本刊开篇文章《商学院的价值观和伦理:做负责任的科学》)是商学院值得思考的战略性问题,这也正是本刊在创立之初就铭记于心的主题。中国企业的发展在全球的影响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而万众瞩目,但无论是学者、企业家,还是政策制定者都不能忘记的是,一个组织重要的战略不仅在于其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创造,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任何组织都是一个社会机构,必须将社会目标和社会责任的实现与承担纳入组织战略与文化价值体系之中。学术研究本质上就是一个社会性的事业,是人类面对资源环境挑战和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不断改善的需求之上的集体知识创造和行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将战略与创新、创业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目标设定为:在全球知识体系中做出中国管理学知识的创造性贡献,不仅为人类经济福利的提升,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需要综合考虑社会、环境和未来的人类福祉,而培育创造新的管理哲学和知识体系。我们认为,这是战略管理、创业创新学科需要确立的目标。

本刊以公元2016年作为始点,是国内与海外战略管理、创业、创新领域华人学者在以上共识基础上做出的一次重大行动。我们期望以此学术平台的搭建为契机,创立一本顶尖的管理学刊物,推动学术共同体朝着有崇高理想和社会价值观的方向发展,迎接国内管理学知识创新时代的到来。本刊当与同侪砥砺意志,共创未来。

此为发刊之词,以共勉之。

《管理学季刊》主编



2016年6月

管理学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6 年卷 1
01/02

目 录

商学院的价值观和伦理：做负责任的科学	徐淑英 (1)
集聚效应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国为例	李 瑜 武常岐 (24)
合规还是违规？期望落差下的冒险决策分析——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连燕玲 周 兵 刘俊良 (47)
隐性制度规则：地区关系文化异质性与指数构建	叶文平 李新春 朱 沆 刘 良 (73)
海归创业者本土适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郑 玮 沈 睿 林道谥 路江涌 (92)
中庸与员工建言：建言预期和地位知觉的调节作用	杜 旌 刘 芳 (110)
辱虐管理与退缩行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王海珍 邱林丹 张若勇 (123)
呼吁与退出：企业间关系衰退时企业权力应用的影响	张 闯 杜 楠 程 晓 (141)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科研博士后招收启事	(159)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高级金融研究院专职科研系列岗位招聘启事	(160)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简介	(162)

Contents

Values and Ethics in Business Schools: A Call for Responsible Science	Anne S. Tsui (22)
Agglomeration Effects and Outward FDI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China	Yu Li Changqi Wu (46)
Legal or Illegal Adventure? The Analysis of Risk-taking Decision under the Performance-aspiration Gap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China's Listed Firms	Yanling Lian Bing Zhou Junliang Liu (72)
Informal Institution: The Guanxi Index Construction and Measurement	Wenping Ye Xinchun Li Hang Zhu Liang Liu (91)
Returnee Entrepreneurs' Local Adapt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Mechanism	Wei Zheng Rui Shen Daomi Lin Jiangyong Lu (109)
Zhongyong and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Voice Expectation and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tatus	Jing Du Fang Liu (122)
The Effect of Abusive Supervision on Withdrawal Behavior: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Haizhen Wang Lindan Qiu Ruoyong Zhang (140)
Voice and Exit: The Effects of Firm's Use of Power When Interfirm Relationship Declines	Chuang Zhang Nan Du Xiao Cheng (158)

商学院的价值观和伦理： 做负责任的科学

□ 徐淑英^①

摘要：无价值取向科学是一种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理想，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更是如此。鉴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和团队，所以在研究过程中选择探究主题、决定资助值得研究的社会问题类型、保护人类等方面，社会、道德、伦理或政治价值观都是内化其中、不可避免的。再者，科学职责要求科学家确保知识信度，是社会政策风险评估负责任的专家。本文解释了与科学有关的两种主要类型的价值观：认识价值观——确保是好科学的规范 and 标准，以及社会价值观——特别用于评估错误结论的成本，进而简释了商学院研究中价值观的作用，以及阐明了社会和政治价值观的侵入如何损害了商学工作者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质量。本文赞同“负责任的科学”这一观点，并引入该观点——认清科学和社会是相互依赖的，科学需要满足认识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为此，本文呼吁，应鼓励商学院的研究向满足严谨性（有效的、可信的知识）和切题性（对实践有用）方向转变——这是负责任的科学或学术的根本特质。

关键词：无价值取向理想；认识价值观；好的科学；垃圾科学；对社会负责的科学；对社会负责的研究；负责任的科学

一、引言

古往今来，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从未间断。很早之前，思想家们就在思考世界、自然、宇宙、社会和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公元前3150年古埃及的天文学和数学，到最近的互联网，科学发现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改进和寿命的增长有无可比拟的贡献。社会科学在治生、治国、和平、防止战争和冲突等方面贡献卓著。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科学研究如雨后春笋，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蓬勃发展。那么，科学是什么？人类无休止的科学探索到底是为了什么？科学探索不止，人们对此

^① 徐淑英，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致谢：非常感谢 Paul Adler、Jonas Haertle、Georges Enderle、Sara Rynes、Rosalie Tung 和 Arjen van Witteloostuijn 对本文所表达观点给予的意见、建议和鼓励。感谢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杨椅伊同学的翻译、录音和整理，以及贾良定教授的校对和润色。

问题的思考和争论也不休。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无价值取向的理想” (value-free ideal) (Churchman, 1948; Douglas, 2009; Levi, 1960; Reichenbach, 1951)。坚持无价值取向的学者认为, 科学工作应当只由内在的科学价值引导 (如信度、效度、解释力), 且应远离社会价值 (如公正、伦理) 的影响。科学家的作用是发现不受任何情境因素影响的客观知识。科学家只对其他科学家而非科学领域外的人负责 (Kaplan, 1964)。因此, 科学家有必要且必须脱离忧患和社会风气, 以保持探究的自主权和思想的独立性, 这种脱离“允许科学家个人将注意力集中于有明确理由相信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上” (Kuhn, 1962)。Kuhn 认为这种自主权很大程度上会带来自然科学的成功。

另外, 无价值取向的反对者将科学视为一种价值取向的活动, 因为科学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人类需求 (Dewey, 1927)。因此, 大量的科学知识不可能没有价值取向。Merton 著名的“科学精神” (1942) 指出, 科学内在规范的正确运作依赖于更广泛的社会价值。认识到科学推理和推断中内在的不确定性后, Rudner (1953) 提出当接受或拒绝一个假设和考虑错误结论的风险时, 社会和伦理价值在判断证据的充分性时十分必要。对于科学家有很多单纯的伦理要求, 如诚实、坦诚、正直。“只有诚实地汇报结果, 或采用所有合理的预防措施来避免实验误差, 或完全控制住与作者观点相反的证据时, 科学才能成功” (McMullin, 1982)。

经过争论, 如今的普遍结论 (尽管有些人

仍然不认同, 如 Lacey (1999)) 是, 无价值取向理想不仅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不可取的 (Douglas, 2009)。无价值取向理想不可能的原因是, 从研究问题的选取到为政府或企业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 在科学进程中的每一步, 价值都显现其中。无价值取向理想不可取的原因是, 社会依赖科学家的理论和研究证据来制定技术、政策和法规 (Douglas, 2009; Hempel, 1965)。科学界期望科学家作为负责任的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 (public servant of knowledge), 确保采用有益、可靠的科学知识来指导政策。由于科学工作与社会世界互相依存, 因此, 无价值取向科学 (如缺少社会或伦理价值影响) 是一种与科学工作的真实情况不相吻合的错误观念。

无价值取向理想和商学院的科学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有两个原因导致这一问题非常重要。第一, 商学院研究的是社会科学领域, 当其根据 Ford 和 Carnegie 的报告^① 提出的挑战 (Gordon & Howell, 1959; Khurana, 2010) 采用自然科学模型后, 就成为了一门具有合法性的科学学科。此外, 商学院研究非常看重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数学等学科的思想。第二, 与其他科学类似, 商学院研究旨在了解和解释管理、企业、组织世界中的经验性困扰。和实践的关联是商学院研究的中枢 (Cummings, 2007; Fisher, 2007; Rousseau, 2006; Rynes & Shapiro, 2005)。照此, 无价值取向理想与商学院研究的关联 (见注释 1) 在反映上述问题方面是正当且重要的。

^① 这是由 Ford 基金会和 Carnegie 基金会资助的, 几乎同时完成的有关美国大学的商务教育的调查研究。1959 年两个调查分别出版了研究报告: 一本是由 Gordon, R. A. 和 Howell, J. E. 主持完成的题为 “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 的报告, 另一本是由 Pierson, F. C. 主持完成的题为 “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men: A Study of University-College Program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的报告。如 Gordon 和 Howell 的报告指出, 相比过去, 在未来的数十年, 商业人士需要更高水平的分析能力和组织技能, 掌握更加复杂的分析工具, 具备应对外部商业环境和迅速变革的更高的能力。

因此,本文的主要着笔点是提出“价值和商学院科学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为了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我对现今的商学院研究进行分析后得到了悖论。商学院研究遵守(或至少似乎是遵守)的是认识价值观(epistemic values),但它同样蕴含社会(或非认识)价值观。这些非认识价值并未将研究与社会世界(如企业)融合起来,而是隔离了这两个世界,由此产生了悖论。这一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两种内部利益相关者(期刊编辑和学校领导)主导了对科学工作的评估。这一评估过程系统地排斥了第三个群体,即经理人或决策制定者,他们是外部利益相关者(Aguinis, 2012)和组织研究的“最终支持者”(Davis, 2015)。而且,在运用科学研究之内的价值观时也会负载研究之外的价值观。我将会说明这种内部聚焦,以及科学进程和推断中非认识价值观(特别是政治价值)的浸渍,会不利于商学院科学的诚信。它们导致了垃圾科学(junk science)——无法满足能力或诚信的最低标准的科学——的扩散(Huber, 1991)。如今,它们导致了商学院人才的滥用。本文的结论是呼吁商学院采用负责任的科学的观点(Kourany, 2010, 2013; Tsui, 2013b, 2015)(见注释2)来重建科学的诚信,提高科学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有益性,并为科学家提供真正的自主权。通过这种变革,商学院的研究功能会转变为专门致力于真正的科学和学术研究,并更好地服务于商学院和社会。

二、两类与科学潜在相关的价值观

与科学有关的价值观大概可被分为两类(Douglas, 2009)。第一类是认识(包括认知)价值观(epistemic values)——判断理论和证据的充分性的规范或标准。“当它有利于好的科学,

它就是认识价值观,认识价值观是好的科学推论的规范和标准的一部分”(Risjord, 2014)。第二类是与引导科学行为无关的价值观。McMullin (1982)用非认识(non-epistemic)这一词语来指代所有不与发掘知识的“真实性”直接相关的价值观。这些大概包括社会和伦理的非认识价值观,可能影响科学进程很多阶段的决定,特别是在选择研究的问题、评估创造的知识对实践或政策的启示以及判断理论或证据错误的后果时(Douglas, 2009)。Rijvold (2014)将这些看作道德和政治价值观。社会或道德价值观是与社会、团体或个人有关的期望条件,例如,财富或健康是适用于社会、团体或个人的社会价值观。伦理价值观是我们应当做什么的信念和标准;公平或诚实是很多社会的伦理价值观。社会和伦理价值观尽管并不一样,但常常相关联,例如,公正或诚信有许多伦理维度,但是同情或成功并不包含伦理因素,至少并不明确包含。政治价值观可能反映了特定团体或个人的偏好,如出资机构指定资助的研究类型,评估委员会判定可被采纳的期刊类型,审稿人总是偏好与问题或数据无关的理论或方法。

(一) 认识价值观(Epistemic Values)

认识价值观是评估达到科学目的的理论或证据的准确性的标准,如研究是否创造了能使我们更接近真相的可信的、有效的知识。与商学院研究相关的认识价值观的例子有构念效度、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和预测效度。若未满足这些价值标准,就降低了从研究结果推断得出的知识的可信度或准确性。一般来说,科学界一致认为评估理论或证据的可信度与认识价值观相关(McMullin, 1982)。声称无价值取向理想研究者的个人价值观或个人偏好不会进入这种评估中。但是,科学工作,不论是选择理论还

是方法，都蕴含价值判断（McMullin, 1982），且在科学活动或评估中应用认识价值观时，个人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在场（Brown, 2013b; Douglas, 2009; Risjord, 2014）。以构念效度为例简单阐述，通常，我们采用 0.80 的水平（不论是内部一致性、不同评分者评分的一致性，或是重测信度）作为测量信度的可接受水平。但是，对新的测量值来说，我们也可接受较低的水平。对某些测量值来说，我们甚至不需要信度估计（如 ROA 作为收益率的测量值）。因为不确定测量值的真实信度，当研究者决定选取 0.80、0.70 或 0.60 来表明信度的可接受水平时，社会价值观就“在场”了。我们让科学家（如作者或审稿人）选择对研究来说合适的水平，因此当一些科学家愿意接受较低的临界值，而另一些人坚持较高的临界值时，科学家的个人价值观在这一决定中起到了作用。同样地，通常大家更偏好具有强内部效度或更高预测效度的理论和证据。但是，当研究者的个人差异影响了判断时，如考虑研究主题的重要性、数据收集的困难性或特定理论或数据收集方法的偏好等，也会涉及非认识或社会价值观。

相对于认识价值观，认知价值观（cognitive values）包含了更多的不确定标准，尽管两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有些认知价值观被用来评估理论的简易性（与复杂性相对）、范围（狭窄或宽广）和解释力。通常一个简单特别是精妙的（明确地反映了研究者的品位）的理论，比一个复杂的理论更受欢迎。代理理论（Jensen & Meckling, 1976）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而制度理论（DiMaggio & Powell, 1991; Scott, 1995）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广阔或普适的理论相较于适用范围狭窄的理论更受欢迎，尽管在管理学科中许多“中段”理论（midrange theories）在研究组织时最有用

（DiMaggio & Powell, 1991; Scott, 1995）。含有强解释力的理论相较于解释力有限的理论更受欢迎，虽然其他研究者可能回避只解释了结果变量的很少方差的模型，但是当观点新颖且精妙时，一些研究者愿意接受较低的解释力。简易性、精确性和普适性之间存在折中（Weick, 1999）。简单的理论可能并不精确，如同代理理论（Ghoshal, 2005）。普适的理论可能既不简单也不精确。科学家对简单或复杂的理论偏好各有不同，这种偏好也影响了其对另一个科学家在研究中的理论选择的评估（如审稿）。

科学家一致同意，在发现理论空白或证据的不精确性以及确保防范错误推断时，认识和认知价值观极其必要。但是，他们也认为社会和伦理价值观常常更间接（有时候甚至直接）地影响研究过程，实际上，它在为断言科学工作的可接受度和所创造知识的潜在用途而解释其理论或证据的精确性时更为有用。

（二）社会价值观（Social Values）

社会价值观是指并不内化于科学工作，但当考虑断言知识的可靠性时可能进入研究者思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的价值观。对社会有用的社会价值观，如公正、自由、社会稳定或人类尊严常常与伦理价值观重叠。当它们参与研究时，是期望能保护人类免受伤害，如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创立（Ippoliti, 2015），限制了科学家在研究中对人类的使用。这样一来，社会价值观——保护人类福祉直接进入了科学进程中。除了有助于社会，有时也有负面的效果。因为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可能推迟研究项目或需要修正研究设计，这种妥协可能使得研究项目或设计不能完全满足认识价值观。选择研究方法可能受到社会价值观而不是认识价值观的影响，例如，Kulik（2011）用管理研究界的多层次、多种数据源和纵向研究设计来描述人口

的持续增长。对研究者来说,这一研究设计有巨大的挑战,包括伦理审查委员会同意这一复杂的研究设计、增加了组织提供如此复杂数据的要求、影响了组织研究的进程等。提出或采用复杂的设计反映了认识价值观(如果对所研究问题来说是必要的)的要求,但也可能是科学家的个人喜好驱使的(体现出老练或自豪,或期望取悦审稿人)。在考虑结果推断错误的后果,即归纳风险(inductive risk)(Hempel, 1965)这一问题时,社会或伦理价值观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证据永远是不完整或有瑕疵的,无法确实地支持假设,因此基于现有证据接受或拒绝假设都存在风险,即产生了经典的一类错误(拒真,即事实上零假设是真的,但被拒绝而接受了备择假设)或二类错误(纳伪,即事实上零假设是伪的,但被接受为真而拒绝了备择假设)。需要价值观来权衡每种错误的后果。

讨论归纳风险时常用的例子如在消费用品(如食物或药物)或工业用品(如建筑材料或杀虫剂)中使用化学材料。一类错误(type I error, 假阳性即拒真错误,当实际无害时推测为有害,即拒绝了实际上成立的零假设 H_0)会导致政府为了保护公众而实施不必要的监管。二类错误(type II error, 假阴性即纳伪错误,当实际有害时推测为无害,即接受了实际上不成立的零假设 H_0)会如研究证据所示导致政府实施宽松的监管(错误的),从而增加了公众健康的风险。科学家有责任为政策制定者提出每种错误行为的后果的建议。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公司的决策制定者需要分别权衡消费者成本和产品成本。消费者可能偏好较严格的统计显著性标准(来减少一类错误或假阳性),而行业偏好较宽松的标准(来减少二类错误或假阴性)。增加样本量会增加检测力度并减少二类错误,但也会增加研究成本。在此例中,评估归

纳风险的后果时应当让谁的价值处于优先地位:公民、行业或科学家?显然,这是一个社会价值观而非认识价值观的问题。

归纳风险观点(inductive risk)同样适用于评估企业研究。在处理代理问题时,代理理论(Jensen & Meckling, 1976)的建议是提高高管报酬,以此例分析:根据代理理论,经理人和所有者(私有企业或上市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目标冲突,且监督经理人的行为非常困难。因此,提高经理人的企业所有权的奖励制度应当会增加目标的一致性。当经理人做出有利于企业和股东的决策时,就是目标一致。一系列研究表明,经理人股权与股东利益一致的战略和金融决策相关(Eisenhardt, 1989)。实际上,这意味着高管的股权薪酬会增加股东回报。基于这一知识,从1976年开始,公司开始采用高管股权薪酬。但这个理论的成立基于两个假设:一是所有人都是自私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二是若给予钱财,对方一定会服从指令,这也是错误的,因为很多人做事不是出于金钱。所以这两个基本假设出现了问题。在Jensen和Meckling提出该理论时,他们自己并没有提供实证证据。尽管后来有研究验证了他们的结果,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并未报告没有成立的结果。因为我们倡导不做重复性研究,也不鼓励报告不支持假设的研究,所以导致了错误的延续。结果这一理论被广泛引用,并对企业的实践产生极大的影响。Martin (2011)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报告,当CEO的报酬激增时,公司绩效会降低。特别是,在1980年之前的20年,365家最大的公开上市的美国公司的CEO报酬的每股净收益下降了33个百分点。同一时期,S&P500(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实复年收益是7.5%。换句话说,在1976年之前,因为股东相对报酬的持续减少,CEO挣得比他们多。在

1976年之后，CEO 报酬的每股净收益 1980~1990 年翻了一番（是 1980 年的两倍），1990~2000 年翻了两番（是 1990 年的四倍）。同一时期，S&P500 的实复年收益是 6.5%。显然在代理理论的指引下经理人所做的决策都是使自己的薪酬越高越好，但并未实际提高企业绩效。这表明代理理论并未有助于经理人激励和企业目标的一致，而只是提高了经理人的激励。Martin（2011）总结说，股东财富最大化和高管薪酬有关的观点是世界上最蠢的观点（Denning, 2011）。换句话说，采用高管股权报酬而非治愈经理人贪婪这一疾病，使得病人病得更重，或变得更贪婪。

显然，采用截面设计或有限时段理论（Jensen & Meckling, 1976）和早期的研究证据（Eisenhardt, 1989）都表明了高管基于所有权的报酬和公司绩效间正向相关。因为这一假设中存在内部不确定性（理论和证据都有），所以有必要在将这一知识运用于实践之前检验归纳风险。这一假设的一类错误是两者不存在关系。实际上，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两者关系为负。代理理论的研究并没有践行认识价值观（检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社会价值观（评估归纳风险的后果）。代理理论研究的假阳性错误对股东来说成本巨大。尽管只是金钱成本，但科学研究

的假阳性可能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后果，如原子弹的发展。科学家需要在 Trinity 试验（原子弹的第一次爆发）前评估归纳风险，因为担心原子系列反应可能导致核灾难（Rhodes, 1986）。只有经过谨慎的评估，得出了不可能的科学结论，科学家才会继续检测原子弹。同样地，分析与应用金融工具有关的归纳风险可能阻止或至少降低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Wolf, 2014）。这些例子表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家都在道义上有责任考虑他们所做的科学工作的正反两面的后果（Douglas, 2009）。为了实现这种责任，社会价值观在评估任何理论（如组织设计、领导力、战略、奖励制度）和相关具有实践意义的实证证据时都是必然和可取的。

总之，认识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在追求负责任的科学和谨慎运用科学知识中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表 1 总结了两种价值观类型和它们分别在科学进程中的作用，它表明认识价值观主要具有直接作用。但是，研究使得认识或认知价值观随着时间不断修正，如估计测量值信度的统计方法的发展；而社会价值观不论是在指导科学工作、评估可靠知识的准确性，还是在思索错误推断的后果时，可能既具有直接作用也具有间接作用。

表 1 认识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在科学中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价值观的作用	认识/认知价值观	社会/伦理价值观
直接	是评估科学推断和证据的充分性的标准 - 理论的本质：范围（简单与复杂）、准确性（弱与强）、普适性（狭窄与广阔） - 理论背景假设清晰合理 - 选择：方法、数据收集、数据解释 - 有效性、可靠性、样本代表性、适当的统计过程 - 统计敏感性和一类/二类错误	是约束或目标但并不妨碍内在的科学推断 - 选择从事或资助哪些项目，如社会的紧迫问题（气候变化、食品安全、歧视、工作压力、老龄化） - 权衡研究新技术的成本和效益，如转基因 - 决定合适的方法或样本，如在测试药物或化学物质时用动物还是人 - 当人是研究对象时，在研究中保护他们
间接	基于证据、理论或价值修正认识/认知价值观或标准（Brown, 2013a）	补足推论的不完整信息（推论差距），估计错误推论的后果（归纳风险） - 经济与社会成本（如一类和二类错误的后果，增加样本规模来减少一类错误） - 公正、安全、隐私（如被影响群体的归纳风险的成本和效益）

三、价值观和商学院研究

目前为止的探讨都是基于假定科学是可信(真实的)知识的发展和累积,且它们能在自然和社会世界中得以运用并解决问题。科学家因为其在知识方面的权威地位,在科学工作中应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通过严格践行认识价值观),并对评估与科学推论和实证证据相关的不确定性的归纳风险程度(通过深思熟虑并负责地践行社会价值观)肩负道德责任。

商学院的科研目的到底是什么?正如大多商学院的网站所描述的,也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运用科学方法做严谨的研究来创造与企业组织有关的知识,如企业如何运作、如何提高绩效、增加创新。二是运用本院教员和其他学者的高质量研究所创造的知识,培养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从而改善企业实践。如此,企业拥有了好的产品、管理方法和服务等,可以提升人类生活的质量。因此,商学院研究必然受到认识价值观(研究是否符合严谨的科学)和社会价值观(研究是否产生了有用的知识)的评估。接下来分析价值观如何体现在商学院研究的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选择研究的问题;第二,评估理论和研究方法;第三,对实证结果的阐述;第四,选择发表研究结果的途径。

(一) 选择研究的问题

从一开始,企业和管理领域的宗旨就是致力于提高组织生产效率、促成员工合作、利于工业和社会发展的研究(Barnard, 1938; Khurana, 2010; Dauten, 1958)。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成立于1936年,就是为了支持和促进商学院的研究和教育使命。《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的创始主编 Paul Dauten, Jr.在创刊的编者声明中明确了研究的目的:

“学会的总体目的是培养这样一种管理哲学——提高工业社会的效率和效力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在任何哲学中都是公众利益至上,但是应适当考虑资本和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管理研究从1958年至今是否有达到这一期望呢?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好奇, Walsh、Weber 和 Margolis (2003) 分析了 1738 篇发表在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 上的 1958~2000 年的实证文章。他们发现超过 70% 的文章聚焦于绩效导向的结果(效率、生产力、收益率、市值、创新等),不超过 30% 聚焦于社会结果(满意度、健康、压力和社会责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领域的学术更多追求的是社会的经济目标而非其社会目标”。运用 1981~2012 年关注中国样本的管理研究, Tsui 和 Jia (2013) 更新并扩展了这一研究,他们预期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学者倾向于两种结果均重视。他们分析了发表在六大顶尖英文期刊(AMJ、ASQ、JAP、JIBS、OrgScience 和 SMJ)上的超过 300 篇文章,以及在三大中文期刊(见注释 3)上的近 3000 篇文章,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比 Walsh 等(2003)的研究更令人吃惊。超过 80% 的六大英文期刊的文章和超过 90% 的中文期刊的文章关注的是绩效或经济成果,且个体、组织和社会层面研究的趋势线都大同小异。这些结果表明东西方科学家在组织研究中都更重视经济结果而非社会结果。经济价值的主导地位持续了多年且没有减少的迹象。管理研究并没能实现 AMJ 的创始主编阐述的高尚目标,即工业社会的研究应当既强调经济目标又强调社会目标,且最重视公众利益并适当考虑资本和劳动力的合法权益。近年来,期刊编辑们试图将注意力转移至社会结果。例如,

2012年,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以组织中的关心和同情为主题举行了一次专题讨论 (Rynes, Bartunek, Dutton & Margolis, 2012); 2014年 *AMJ* 的主编呼吁以老龄化和管理 (Kulik, Ryan, Harper & George, 2014)、气候变化 (Howard-Grenville, Buckle, Hoskins & George, 2014)、德行组织 (Hollenshe, Wookey, Hickey & George, 2014)、管理的巨大挑战 (*AMJ*, 2015) 等为主题的研究;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会刊《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呼吁人性化管理 (Tsui & Jia, 2013)、聚焦非洲情境的管理 (George, 2015) 的研究; Tsui (2013a) 倡导富有社会责任和同情心的组织和管理研究。关心研究对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显现在其他许多科学和行业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号召高校、基金会、慈善家和公司一起加入他所强调的在能源、健康、教育、环境、国家安全和全球发展领域的“巨大挑战”体系。美国国家能源协会 (NAE) 认定了 14 种巨大挑战 (NAE, 2013), 如清洁水源、预防核恐怖活动、保卫网络空间等。它鼓励通过这些挑战领域的工程研究将世界打造一个更适宜居住的地方。换句话说, 已发表的文章和对新研究的号召都体现了科学界和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的政策制定者的社会价值观。只要主题满足社会需求, 利用这些价值观来引导研究主题的筛选就是可行的 (Kourany, 2010, 2013)。不幸的是, 如今大多数组织与管理科学的研究者是通过解析文献的文本来寻找需要填补的“理论空白” (Alvesson & Sandberg, 2011; Davis, 2015; Suddaby, 2014), 而非探索真实世界的新的研究领域。利用现有文献作为新研究的思想来源使得研究总是聚焦于现有文献, 探讨的问题依然是主流持续关注经济后果, 贡献的是增值性而非开拓性的研究。然

而, 研究新主题对年轻 (甚至资深) 学者来说可能具有风险 (Tsui, 2013b)。不安全感和维持地位 (一直贯穿现今范式) 是指导商学院的科学家决定研究何种主题的主要非认识价值观。一方面选择利于提高企业绩效的问题, 却不关注企业对其他人群的影响; 另一方面选择主编、评审、同行喜欢的题目, 而不关注对社会是否有帮助。社会价值观影响了选题, 科学家往往选择对于科学界至关重要却对社会或企业无关紧要的问题。

(二) 评估理论和研究方法

管理研究一个有趣的发展是, 有很多人声称为了提高研究对知识的贡献而越来越重视理论 (Hambrick, 2007; Suddaby, 2014)。在评估是否接受一篇研究论文时, 对理论的贡献成为重要的认识价值观。出于对 *AMJ* 的文章是否以及如何贡献于理论的好奇, Colquitt 和 Zapata-Phelan (2007) 分析了 1963~2007 年的 667 篇文章。他们将文章对理论检验和理论构建的贡献采用五点量表进行编码, 发现在最初 27 年 (1963~1989 年), 大多数文章主要都是报告者 (描述现象而没有理论) 或理论构建者 (用归纳或演绎的方式发展新理论)。原因是处于研究早期, 有很多崭新的现象。最近 18 年 (1990~2007 年) 的文章则大多数是检验者 (检验理论的假设)、扩展者 (为更清楚地阐明理论的内涵和解释而加入中介变量)、验证者 (为探究理论的局限和边界而加入调节变量) 和一小部分定性研究的构建者, 并无报告者。实际上, 2000 年后的大多数文章都是理论阐述的研究。这一规律并不令人惊异, 因为 *AMJ* 是一个聚焦理论的期刊。其他期刊, 特别是基于现象 (强调实证难题) 研究的期刊可能并没有这么强的理论导向。然而, *AMJ* 主导着这一领域。大多数管理研究者读 *AMJ* 的文章, 并期望自己的研究能

达到 *AMJ* 论文的标准。大多数 *AMJ* 审稿人也会审阅其他期刊。不管怎样, 这些研究者(作者或是审稿人)也会将理论焦点带入其他期刊。

Hambrick (2007) 探讨了与自然科学或其他商学院的学科(如会计、金融和营销)相比, 管理研究过于重视理论的问题。在科学中, 发展或应用理论是为了解释并理解实证难题。然而管理学中的理论已经完全脱离了实证难题, 而贡献于多年来被许多学者所讨论的“研究—实践差距”(Cummings, 2007; Hambrick, 1994; Pfeffer, 2014; Rynes, 2007; Walsh, 2011)。已有许多学者试图理解为什么管理学研究将理论具体化为研究的典型焦点, 以及为什么它在企业和管理世界中如此脱离的现象。Birkinshaw 等 (2014) 和 Suddaby (2014) 警醒我们要将好的理论与“盲目崇拜理论”区别开来, 后者指的是“已经成为程式化的、呆板的、人造的理论, 或理论很大程度上通过文本解析而非经验提出”, 且这种理论的仪式化和合理化“大多与不断增长的文章发表的职业压力相对应”(Suddaby, 2014)。盲目崇拜理论和科学主义总是将理论优先于所解决问题或科学表现的重要性或相关性, 要求理论家识别并填补现有理论中日益有限的空白, 因此越来越远离实践。Suddaby 接下来指出, 当理论变得越来越盲目崇拜, 它们也会更加“科学”。也就是说, 它们采用的是表面形式——形式、语言和科学的表达——而没有对新知识的实用性贡献。因此科学主义用理论和方法的正式语言来解释显而易见的事物或是重新塑造现有的知识……采用一种更加复杂的方法或润色过的理论框架来解决陈旧的问题, 相较于新知识或新视角的产生更加重要。

除了理论的盲目崇拜和科学主义, 也有对数据进行歪曲、伪造或选择性地报告结果(偏

颇选择), 或者事后设立假设 (Bedeian, Taylor & Miller, 2010; Tsui, 2013a, 2015) 等有问题的研究实践的担忧。如研究有三个公司的样本, 其中有一个公司的结果不同于其他两个, 科学家若不去思考为何不一样, 而直接删除不支持假设的样本, 这就是歪曲数据。伪造数据就如几个科学家在一个小团队中一起写文章, 每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 但其实每个人只写了一篇。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 但都不是科学的。因为科学家需要认识这个领域、问题, 所参与的研究是自己的思考, 而不只是一个生产活动。尽管对科学不端行为的问题严峻性存在争论 (Fanelli, 2009), 研究报告中从琐碎的到发人深省的事件已发生。对自然科学中 18 篇关于不端行为的研究进行元分析, 发现 2% (加权平均值, $N=7$, 95%, $CI: 0.86\sim4.45$) 的科学家承认至少有过一次歪曲、伪造或修正数据或结果。高达 33.7% 的人承认存在其他有问题的研究实践。因为这是自我报告的, 结果可能低估了真实情况。Bedeian、Taylor 和 Miller (2010) 调查了商学院 384 名终身制和非终身制员工, 询问他们是否观察到同事有 FFP 的行为, 即歪曲 (Falsification)、伪造 (Fabrication)、剽窃 (Plagiarism), 大多数 (27%~79%, 根据 FFP 分类的特定实践) 报告称他们曾见过这些不端行为。其他一些如偏颇选择、样本存在问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的观点等有问题的实践活动, 其比重则达到了 92%。研究者可能过度报告了同事从事的这些行为。但是, 基于社会期望, 科学家应当积极地保护自身职业名誉并尽量减少不端行为的研究 (Fanelli, 2009)。真相可能在自我报告和他人报告之间。这些行为表明迫于发表文章的压力, 有些人对科学的意义其实并不了解。当其他人做重复性研究发现结果不为真或很随机时, 则被前述研究的成果

误导。所以在未清楚掌握的情况下就发表自己也认为有问题的文章，不符合科学的标准。

无视发表的结果和真实的结果之间的严重不同，作者有许多种方式撰写有趣但其实并不真实或容易令人误解的文章（Nosek, Spies & Motyl, 2012）。Davis（2015）同意这一发现，“很多地区已开始共同认识到期刊和学术生涯奖励制度在发表时都更青睐新颖性而非真实性，所以个体学术研究者常常因为有趣而非做得正确从而受到褒奖，这导致了发表体系的系统性偏差”。

崇拜理论具有理论的形式，但它并没有直接与任何实证现象相关联。科学主义鼓励学术性，偏爱流行的建模方法，喜好统计过程或新颖聪慧的观点而不顾它们的实质重要性或对认识的推进（Birkinshaw et al., 2014; Pfeffer, 2014）。如一味采用现有的理论和方法，却不考虑是否适用于所研究的问题和数据；有时候数据简单、样本量小，却仍采用结构方程或 HLM 这些流行方法，并想尽办法说服评审接受等。这些都是追求发表的目的而不是希望结果具有可靠可信的价值来引导我们做研究。这些研究实践反映了权宜之计、工具主义、追随流行、个人偏好、（工作或职业）不安全感、追求名利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既不是认识的也不是社会或伦理的，而是把潜在好的科学变成垃圾科学的有害价值观。

对理论盲目崇拜和有问题的研究实践，应当在科学工作的审阅过程中进行检测。不幸的是，审阅过程也充满问题（Bedeian, 2003, 2004; Starbuck, 2003; Tsui & Hollenbeck, 2009）。最严重和最普遍的问题是在评估稿件时受个人偏好（一种社会价值观）而非科学标准（认识价值观）的主宰。Bedeian（2003）调查了两本顶级管理学期刊 *AMJ* 和 *AMR* 的 178 位作

者有关审稿过程中的经验。他指出“调查中最令人不安的发现是，超过 1/3 的人回应称稿件中的意见修正是基于审稿人的个人偏好，几乎 25% 的人声称在修改稿件时所做的改正实际上感觉是错误的”。Starbuck（2003）给“编辑决策包含偏差和不可测性”提供了证据。实际上，非认识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在科学工作的评估（稿件审稿过程）中十分泛滥，这也导致了哪些文章能被发表的不可测性（Starbuck, 2005），威胁到了科学的诚信和有效知识的创造。

（三）实证结果的解释和展示

认识价值观支持对有缺陷的实证研究的探测并确保证据的不确定程度在可接受范围内。重复性研究和同时报告正负向的结果都是重要的认识（社会）价值观。但是在很多领域，对验证假设的结果有很强的偏好。不显著、与假设或已有发现不一致的结果或异常值总是不被报告。这种确认偏误在心理研究中无所不在（Nickerson, 1998; Nosek et al., 2014），且蔓延到了管理学中（Davis, 2015; Leung, 2009）。这种对假设选择性报告、偏颇选择结果和基于结果形成假设的做法，与证伪性和重复性的科学原则以及诚实正直的社会期望不一致。不幸的是，审稿人并未察觉这样的实践，更有甚者在审稿过程中教导或坚持让作者移除不被支持的假设，而对理论和结果推断的错误结论的后果并不在意。结果，发表出来的文章可能充满了假阳性结论。这种确认性偏误部分反映了常规科学范式（Kuhn, 1996）的支配地位。

“范式”一词来源于 Kuhn 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此书主要介绍了科学的发展，并研究科学的进展是怎么发生的。他用范式一词形容每一阶段提出有关一个问题主要的解释理论和方法，之后有一系列的研究去验证此想法、理论的对